

# 谷春帆的经济发展理论\*

孙大权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之前谷春帆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谷春帆研究了发展经济学几乎所有基本问题;他初步构建了“农业改良和工业化相互牵制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体系;他以工业化建设为中心、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实施对外开放等主张被实践证明为正确,已经成为“中国道路”的一部分。谷春帆发展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家结合中国实际使用中国语言叙述中国故事,它至今仍有解释力。谷春帆的理论贡献说明: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

**关键词:**谷春帆 工业化中心 农业改良与工业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

本文探讨的主题是:1950年前后欧美发达国家形成西方发展经济学之前,近代中国有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发展理论吗?对此,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和创立者多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初生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待于培育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立没有多少贡献。<sup>①</sup>另一方面,叶世昌等学者提出: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发展理论。<sup>②</sup>笔者赞同后一种主张,并进一步探寻:在张培刚、刘大钧、马寅初、方显廷、谷春帆等诸多学者提出的若干发展思想中,有没有中国学者提出过能够与西方学者媲美的系统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谷春帆就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他提出的“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同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纳克斯(Ragnar Nurkse)、刘易斯(W. Arthur Lewis)等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相比,在理论的原创性、系统性、深刻性、解释力等方面可能并不逊色。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介绍时代背景与谷春帆的思想特点;其次,介绍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最后,论证谷春帆是中国和世界第一代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了避免误读和拔高谷春帆的发展理论,本文尽量引用谷春帆原著,并注重谷春帆与中外经济学家的比较分析。

## 一、时代背景与谷春帆的思想特点

谷春帆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索强国

[作者简介]孙大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邮箱:sundaquan@fudan.edu.c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和经济思想研究”(13BJL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研究”(11AZD08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重要修改意见,感谢叶世昌、高帆、叶坦、邹进文、程霖、周建波、张亚光、张晖明、严法善、尹晨、张涛、陈硕、方钦等先生的重要评论。文责自负。

① [美]杰拉尔德·迈耶等编,谭崇台等译《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没有提到任何中国学者的贡献。[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著,唐宇华等译《经济发展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提到了孙中山是经济发展思想的先驱之一,却没有提到中国学者的贡献。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偏重思想史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也没有提到中国学者的贡献。

② 相关论著主要有: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代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邹进文、李俊《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三次发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

富民之道,康有为主张“定为工国”,孙中山提出了《实业计划》,等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之一。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同时,在有些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据吴承明等估计,1920年到1936年,去除物价上涨因素,农业总产值增长17.5%,工业总产值增长52.3%,交通运输业总产值增长97.6%,近代化工厂的总产值增长172.5%。<sup>①</sup>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和不发展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

与近代经济的缓慢发展不同,中国近代经济学却出现了快速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经济学论著大量出版,1902—1911年平均每年出版经济学著作约11种,1912—1926年平均每年达100种,1927—1936年平均每年高达680种,1937—1949年战争期间平均每年仍有630种。<sup>②</sup>1912—1949年总共刊行经济著作19497种,其中专著3837种,译著1781种;明确以经济类命名的刊物2448种;报纸的经济专栏364种。(2)经济学界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工业化、人口、土地、资本、货币、财政等发展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和深入的探讨。<sup>③</sup>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迅速成长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学术和思想资源。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工业化和怎样促进经济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工业落后被动挨打的无情事实,使学术界达成了必须快速工业化的共识,出现了研究工业化的热潮。1942年下半年开始,大后方又出现了研究战后经济建设方案的热潮。<sup>④</sup>由此,抗战时期中国形成了研究工业化和战后经济建设的三大学术团队,即刘大钧主持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了工业化系列丛书7种;翁文灏、吴景超以《新经济》杂志为中心,出版了工业化系列专著多本;何廉、方显廷主持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出版了工业化专著两本和战后经济建设论文集一本,何廉还主持制定了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谷春帆与三个学术团队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sup>⑤</sup>学术界对工业化和战后经济建设方案的深入探讨直接影响和促成了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

前述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学术背景为中国出现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条件,谷春帆发展经济理论的形成,还与他本人是学贯中西的杰出经济学家有关。

谷春帆(1901—1979),<sup>⑥</sup>江苏吴县人。苏州桃坞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圣芳济书院学习进修。18岁时考入邮局当练习生,从此长期在邮政部门工作,抗战时期升至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1944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之一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布雷敦森林国际货币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副部长等职。

谷春帆既没有接受专门的经济学教育,又没有在专门的经济学教育和学术机构任职,作为仅有小学学历且长期任职于邮政部门的官员,通过业余自修成为权威经济学家,<sup>⑦</sup>在官本位且重文凭的中国被视为例外中之例外,<sup>⑧</sup>谷春帆是民国经济学界的奇人。

谷春帆热爱经济研究,对问题研究深透,见解独到,其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有如下特点:1. 系统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4—755页。

②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52—354页。

③ 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④ 阎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⑤ 刘大钧在《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56页)中指出,他主编的工业化丛书《资金与企业组织》一编由谷春帆著,此书后来未见出版。谷春帆著《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纳入翁文灏主编的工业化丛书中。在何廉代表政府主持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谷春帆个人也开始拟定五年计划,由此他完成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

⑥ 关于谷春帆的出生时间,一些书刊认为是1900年,本文采用谷春帆子女2000年自刊的《谬种藏稿:谷春帆诗词存稿》第139页的说法:他出生于1901年4月18日(阴历2月30日)。

⑦ 经济学家张一凡指出:“谷先生是现代经济权威之一,对于经济问题,不但有深切的研究,并有独特的见地”。参见王卫《从财政问题谈到田赋征实—记联合会第三次大会》,《经济周报》第2卷第25期(1946年6月)。

⑧ 朱通九:《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1941年3月)。

研究。他将中国经济问题放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研究。对某一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务求条理贯通,自成体系。2. 运用统计法。谷春帆自学高等数学,勤于收集统计数据,用翔实数据论证经济学理。3. 国际视野,融贯中西。谷春帆没有接受经济学科班教育,因而没有门派之见,能够综合运用马克思(Karl Marx)、凯恩斯(J. M. Keynes)、哈耶克(F. A. Hayek)、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人的理论。谷春帆英语能说会写,长期研读西方经典原著,能够吸收当时世界最新理论。4. 对策切实。谷春帆具有行政官员的务实作风,议论切中时弊,对策步骤清晰,学理兼顾事实。谷春帆独特的经历和思想方法,使得他对中国发展经济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

## 二、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的整体思路和基本框架是:农业国近代转型的中心是工业化建设。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产品市场只有取决于农业社会,工业化需以农业改良为前提;农业改良需要工业化提供新技术支持和解决剩余劳动力,农业改良又以工业化为前提,这是农业国工业化的主要困境。由这一困境导致既不能节约又不能消费的资本积累困境,以及人口数量过多质量太差与生产发展不协调的人口困境,加上发展轻工业符合比较优势却不符合国防战略的产业政策困境。要摆脱发展的诸多困境,必须主动利用国际合作,也必须采纳计划、统制、自由三种形态混合的经济制度。这一理论构架的核心是“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相互牵制”。其逻辑联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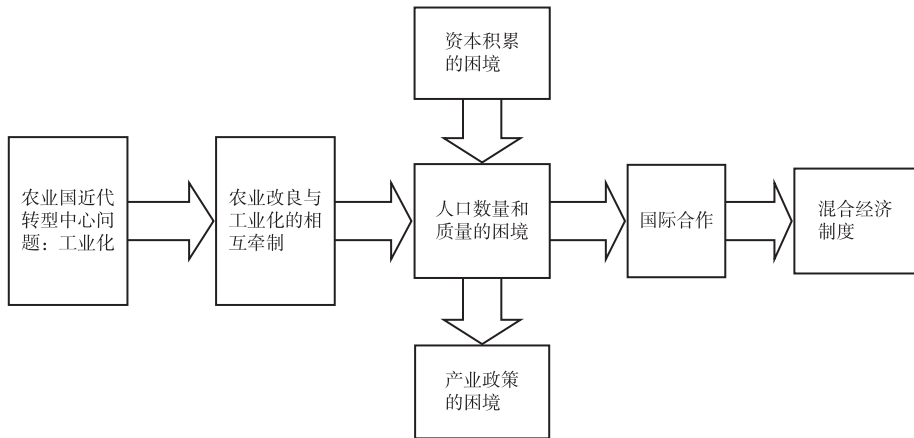


图1 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框架

谷春帆经济发展政策组合的基本框架是:要打破农业社会的诸多困境,政府和社会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用一切办法加速资本积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政府优先发展产业链中有基础有市场的部分基本产业,以此逐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由于国内的多重发展困境,特别需要国际合作,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为了调动各方积极性,应建立混合经济制度,政府职能应根据工业化不同的阶段而改变。其逻辑联系见图2。

下文的“七论”是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整体思路和基本框架的具体展开。

### (一)工业化通论

谷春帆工业化通论的“化”为动词,“通”为社会一切,即认为工业化可改变社会一切。他说:“工业化的化,即是教化风化同化变化的化。所谓工业化,是要以工业来化育来同化其他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制度。”<sup>①</sup>工业化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国一切现状由于农业化,

<sup>①</sup> 谷春帆:《工业化精神》,《大公报》(重庆)1943年6月6日,第1张第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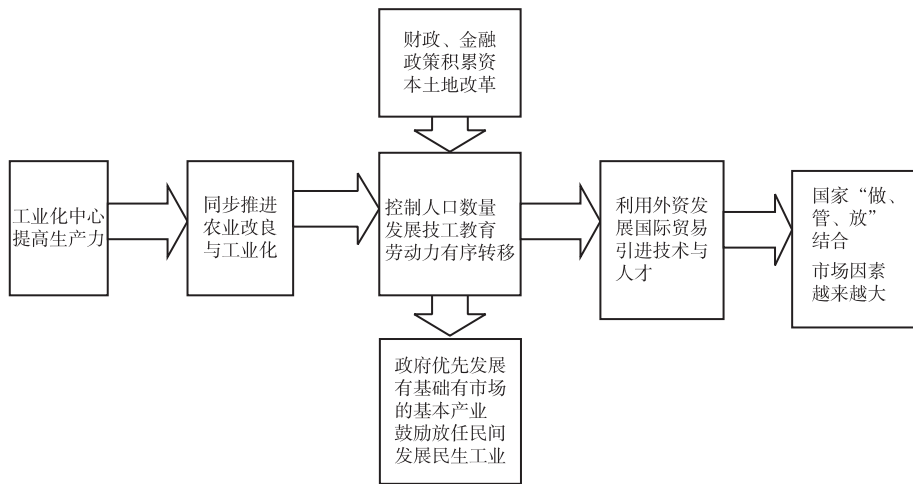


图2 谷春帆经济发展政策组合图

一切改革要待工业化。”<sup>①</sup>“工业化既是问题的核心,是建国必要过程,我们只当努力于工业化。一切政治问题,道德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虽非不值得考虑讨论,却不值得扭结争执。得到工业化发展时,这些问题,自然有个适当的解决。”<sup>②</sup>中国要现代化,社会政治等旧的文物制度思想,一切的一切,像一把乱丝。而工业建设是个可以切实把握的枢纽,政府抓住了这个中心,即抓住了农业社会转变的根本。<sup>③</sup> 谷春帆的“工业化通论”就是“工业化中心论”和“唯工业化论”。

谷春帆的工业化通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生产技术,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基础。其他文物制度思想是建在这种基础上的楼阁。基础改动以后,上层的文物制度思想,自然随之改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谷春帆得出了“工业化是中国革新运动最提纲挈领的办法”的论断。<sup>④</sup>

强调工业化中心作用的中外发展经济学家不乏其人,“工业化通论”的特点是,谷春帆不是将农业和工业两个产业的效率进行对比,而是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整体的效率进行对比,将工业化不仅仅看成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而是看成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整个中国问题的中心。他将工业化的作用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典型的“唯工业化论”。

“工业化通论”在理论上似乎有忽视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等上层建筑作用的片面倾向。然而,从历史演变的事实分析,谷春帆的理论却抓住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改造方案层出不穷,政府和社会始终无法将中心工作集中到工业化建设方面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完成了统一,但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缓慢,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和社会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由此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验证了谷春帆“工业化通论”是颇具智慧的论断。

## (二) 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

1937年,谷春帆指出: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不是工业化,而是农业改良,“只有使农业工业连环了走,使增进的农业生产力作为工业产品的市场,使增进的工业生产力来吸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sup>⑤</sup> 1938年,谷春帆又指出: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农业改革是一个问题,“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业农,其生产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9页。

②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序”,第2页。

③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3—15页。

④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5页。

⑤ 谷春帆:《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提》,《社会经济月报》第4卷第8期(1937年8月)。

物之价值,恐怕亦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产品及其副产品,所以中国工业化,要劳力,得问农村要;要资本,也得问农村要;要市场,也得问农村要;要原料,也得问农村要。中国工业化问题与中国农业改革是一个问题,脱离农村,即无复工业化可言,中国工业化不是平白地建立工业,是要将根深蒂固的农业尽可能尽无摩擦地改变为工业。”<sup>①</sup>

谷春帆从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互动中发现他们存在相互牵制的关系。他指出:

农业改良,农业生产力逐步增加,即逐步有剩余劳动力赋闲出来。如何使此项剩余劳动力有效地应用到别种生产事业上去,即为中国工业化之大问题。……农业改良一种工作,其本身即需要新的劳动,故一部分剩余农村劳动,可姑认为即在农业改良的本身中吸收下去,暂时也可不管职业转移的困难。然而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不赖工业及其连带的运输金融等制度来吸收,因之农业改良之速度,非但在技术上,即在社会观点上,亦不能不受新工业化速度之限制。

工业化之建立,第一要资本,而中国民族资本之蓄积,又不得不有赖于农业之改良。因而工业化之速度,不得受农业之限制,两者互为 Vicious Circle. 如其农业改良太快,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工业吸收,或工业生产太快,产品不能为农村吸收,则剩余的劳力,与剩余的产品,均有溃决之可能。

……如其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攒集资本,即使再有二次三次欧战这样好机会,也很难在短期间内成就,也很难打破农工业互相牵掣的恶循环,因之吾以为中国而要急速工业化,急速进到世界生产标准,只有利用外国资本。<sup>②</sup>

根据谷春帆上述论述,可以得出农业改良和工业化的多重牵制,如图3,两个水池(工业化与农业改良)四个管道相互连接,互相牵制。农业改良需要工业化提供新技术,同时需要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受制于工业化水平。工业化需要农业改良提供资本,同时需要农村吸收工业产品,因此受制于农业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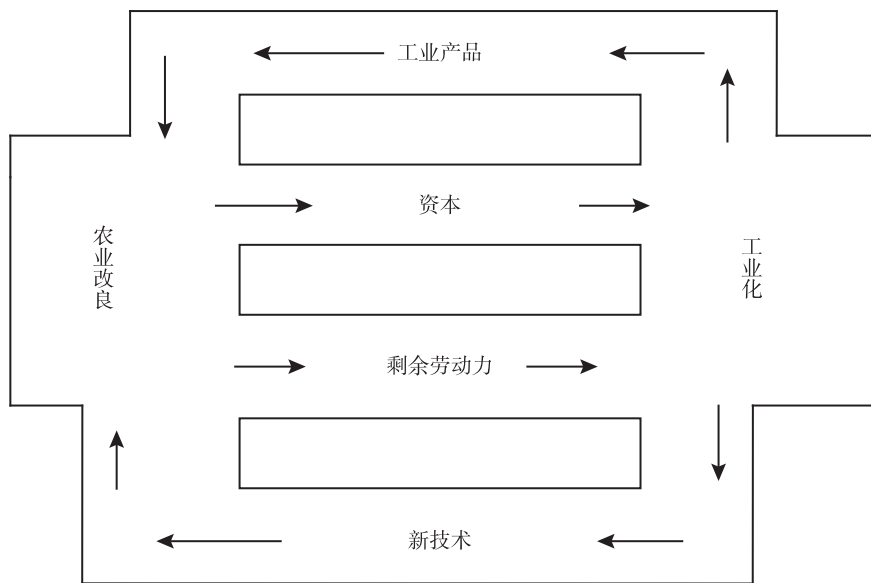


图3 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的循环图

如图3所示,谷春帆已经将发展经济学几个关键概念构建了一个模型,模型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资本形成,工业产品市场,新技术的传播,以及他们与农业改良和工业化进展之间循环流动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前提》,《经济动员》第2卷第2期(1938年12月)。

②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前提》,《经济动员》第2卷第2期(1938年12月)。

相互牵制的关系。此模型虽然还不够完整,但它已经基本揭示出经济发展的本质。

1945年,谷春帆进一步论述了农业改良和工业化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工业之建设,应当与农业改良随同而来。使农业方面增加之购买力,成为工业化之资本。农业省出之劳动力,成为工业劳动。移出种植粮食之土地,种植工业原料,或出口农业产品。而稍后俟工业产品成熟之时,则又以农业上增加之购买力,维持工业生产之市场。”<sup>①</sup>这段论述比较完整地认识到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直到1961年才提出的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四大贡献,即:产品贡献(食品、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资本、劳力)、外汇贡献。<sup>②</sup>

根据谷春帆的上段论述,可得出比图3更完整的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循环关系,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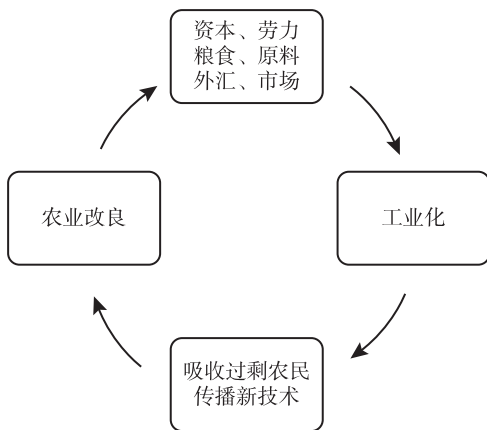


图4 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循环关系图

图4所示,农业改良后,出现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劳力、粮食、原料、外汇和市场,促进工业化;工业化取得进展后,一方面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改善农村人地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肥、良种等传入农村,促进农业改良。农业改良与工业化成为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循环关系。

由谷春帆的论述可以得出三个政策推论:一是因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相互牵制,贫穷的农业国工业化起步阶段非常艰难,即低水平均衡陷阱。如要迅速工业化,必须依靠外力;二是工业化过程中,农工两业很难均衡发展,需要政府调节,不然就会出现失衡,失衡会带来恶性循环,均衡发展才会带来良性循环;三是农业改良与工业化互为前提,必须兼顾二者的均衡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应同步推进。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相互促进,经济发展就会不断进步。否则,单方面突进,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谷春帆对农业改良和工业化相互制约与促进的论断,得益于20世纪20—40年代三次大规模的“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以工立国”派的吴景超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sup>③</sup>“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提出“从农业引发工业”,<sup>④</sup>两派均看到了农业改良和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某些方面,而各执一端,谷春帆在综合两派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主张。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由于受“唯工业化”思想的影响,往往轻视农业的发展,<sup>⑤</sup>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舒尔茨(T. W. Schultz)等人才强调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sup>⑥</sup>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83页。

② [印]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著,吴伟东等译:《农业与经济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③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5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1—862页。

⑤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8页。

⑥ [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9页。

谷春帆在1938—1945年讨论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贡献,以及工业化对农业进步的促进作用,并得出了农业改良与工业化应平衡发展的政策结论。它在时间上领先于欧美发展经济学家,在内容的深刻上也许并不逊于刘易斯、舒尔茨等人的理论。

谷春帆“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是其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其后的资本形成、人口与劳动力、工业化战略、吸引外资、经济制度等方面的论述均与此论有关。

### (三)资本蓄积论

谷春帆认识到:“资本是工业建设的第一前提”,“中国生产力之仅够或甚至不够生活,以致资本不能蓄积,却是中国工业化不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他发现,中国工业化面临提高储蓄能力与提高消费能力的矛盾和困境。

中国之资本甚微,但中国资本亦仍有不能充分利用之处。消费之需要,少于资本生产之货物,则资本不能充分利用。中国人之生活程度如此甚低,其对于消费品之需要,宁有满足。但虽有需要,而无购买力,则其需要不生效力。因为市场之狭小,故生产特种商品之人,往往觉得生产易于过剩,许多新兴小工业,制造胶鞋热水瓶等者,均有此感觉。即制造工业原料如火酒者,当景气于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转为衰落时,亦有同感。

故建设中国产业资本,似陷于矛盾中。吾们既不能节约,又不能消费,既不能供给资本,又不能供给市场。<sup>②</sup>

谷春帆在上文指出了:农业社会低收入—节约消费—提高储蓄能力—积累资本—生产扩大—消费不足—市场狭小—经济不能发展;另一方面,低收入—增加消费—提高消费能力—市场扩大—资本积累不足—经济不能发展,由此陷入了既不能节约又不能消费的资本积累困境。这一理论与1953年纳克斯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两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论非常相似。<sup>③</sup>

谷春帆还指出了农业社会资本积累的其他困境,他说:“资本之增值,与生产率之改进,互为因果。生产率低则资本不易增值。资本不增加,则生产率不易改良。”<sup>④</sup>“市场狭小,购买力缺乏,新的工业产品,只有排挤旧的手工产品,但旧的产业破坏,即系一部分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减少,所以的农业社会的种种条件均以工业化对立。农业社会要待工业化方能改变,但农业社会本身是工业化的阻力。”<sup>⑤</sup>

如何打破中国资本积累的困境,谷春帆认识到必须利用外资。他说:“必须待初期之建设成功,工矿产品可以应市,铁路公路可以通车,水利已有成效,然后人民之生产力提高,可以增加资本之蓄积,可以使以后之工业建设,在国内多筹资本。最初一步发动工业建设之资本,必须大部分由外国投资。”<sup>⑥</sup>谷春帆认识到穷国启动工业化最初需要一大笔发动资金,即西方发展经济学里所说的“投资临界点”,而穷国最初是没有办法自筹的,只有依靠外资,工业化初期成功后,就可以逐步靠自身积累资本。

除利用外资外,谷春帆还特别提出通过土地改革筹集工业化资本,他提议分期付款征购大地主100亩以上的土地,可得土地1.7亿亩,交给农民耕种,每亩租金6元,政府每年收租可达10.2亿元,5年可筹集51亿元,占谷春帆设计的五年计划全部筹集资金142.08亿元的35.9%。<sup>⑦</sup>

抗战中后期,吴景超、伍启元等众多学者探讨了筹集资本问题,谷春帆的资本形成论独特之处在于,他早于纳克斯认识到了资本积累的多重困境,强调了利用外资和土地改革等筹集资本方式。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53—154页。

②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国内资本问题》,《经济动员》第4卷第10、11、12期合刊(1940年12月)。

③ [美]纳克斯:《市场规模和投资引诱》,郭熙保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64页。

④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国内资本问题》,《经济动员》第4卷第10、11、12期合刊(1940年12月)。

⑤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53—154页。

⑥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67页。

⑦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91—92页。

#### (四) 人口与劳动力论

1938年,谷春帆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存在劳动力数量过多、质量太差的严重问题,他说:“劳动供给量过多,是中国工业化的最大障碍。第一,人口太多,生产总额不够温饱,无力储蓄,因之妨碍资本之积聚。中国人民之穷,即因中国人民之多。第二,人口太多,劳动力供给过剩,争夺工作,使生活程度降低。大量产业预备军,愿意在不堪生活的条件下工作,人工比机械低廉,因而妨害机械之使用。第三,人口太多,不能生存,一遇灾荒,往往爆发,成为破坏一切生产力之因素。第四,人口因多而穷,教育不普及,因而影响到质劣。”

在质的方面,“人口问题对于工业化,恐怕更要有切肤之痛。即使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而熟练工人的需要,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sup>①</sup>此段论述明白指出了发展中国的人口困境。

关于如何解决人口太多与工业化的矛盾,谷春帆与陈长蘅等学者一样主张控制生育,但谷春帆却强调节制生育的暂时性,中国工业化初期应限制生育,生产力发展了,又可以奖励生育。他说:“我所说的限制人口生育,不是永久的。现在人多地少,生产力低故要限制生育。将来生产力高,自然又可奖励生育。总以人口的适中量为准。”<sup>②</sup>

关于如何解决劳动力素质低与工业化的矛盾,谷春帆强调要改变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以适应工业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初中高中全应当为职业的与升学的两种,从现在一般家庭栽培子弟的能力而论,职业学校应当特别多,而升学的中小学应当限制极少。”<sup>③</sup>其目的是培养大批技术工人和工头。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谷春帆认同卜凯(J. L. Buck)等调查所得结论,即中国农业劳动因季节性的忙闲不均本身就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sup>④</sup>同时,农业改良后又形成新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工业化的大问题。1945年,谷春帆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有序转移,他说:“在劳动转移一点上,农村改良,要随着工业化,配合前进。过迟则工业化将因缺乏劳动而被拖住,过速则工业化将因农村失业过多,购买力缺乏,甚至社会骚动,而被牵累。”<sup>⑤</sup>

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是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其机制是:非资本主义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本主义部门雇佣这种剩余劳动只需要生存工资,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提高工资,而是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资本家将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由此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sup>⑥</sup>显然,在刘易斯模型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人多是人口红利。而谷春帆却认为劳动供给量过多导致资本蓄积困难,没有动力使用现代机械,教育无法普及影响质劣等等,人多是工业化的障碍和负担。事实证明,刘易斯模型忽视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其他后果,刘易斯后来承认:“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可能的人口增长。……迅速的人口增长打击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sup>⑦</sup>

中国近代主张控制和减少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有陈长蘅、马寅初、吴景超、董时进等,谷春帆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重点研究了人口数量与质量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的关系,他提出了控制人口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等主张。这些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前提》,《经济动员》第2卷第2期(1938年12月31日)。

② 谷春帆:《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提》,《社会经济月报》第4卷第8期(1937年8月)。

③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90页。

④ 谷春帆:《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提》,《社会经济月报》第4卷第8期(1937年8月)。

⑤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0页。

⑥ [美]威廉·A·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郭熙保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68页。

⑦ 杰拉尔德·迈耶等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中译本),第135页。



### (五) 产业政策论

1938年,谷春帆认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是轻工业,他说:“重工业之建立,乃建立工业之工业,自生产至最后消费,如 Prof. Friedrich Von Hayek 所说是 Roundabout Method 的生产,其时期长,其捆住之资本多。轻工业之前途,即为消费,其生产过程短而资本额少,资本之来源不外储蓄,以中国人民生活程度之低,求生之急,长期储蓄必更降低其生活程度,对于人民之急迫之需要不合,而有引起政治上困难之可能。”加上中国本身的资源情况,“故重工业成立比较困难,在适当的保护下,加工工业或有发达的希望,而比较最有希望的则为轻工业。”<sup>①</sup>

1947,中国在抗战中因为没有国防重工业而被动挨打的经历使谷春帆认识到:“一个以精细轻工业立国的国家,是不适宜于现代世界的。”“工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工业的工业,系于钢铁、燃料、动力。”“钢铁工业既是工业建设的基本,又是国防安全的保障,不能单从成本贵贱上着想。”<sup>②</sup>

以上论述说明,谷春帆认识到发展轻工业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但是,从立国和国防的大计出发,又必须发展基本重工业。这就指出了中国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困境。

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的困境,谷春帆的办法是,政府优先发展有基础有市场的基本产业,<sup>③</sup>鼓励放任民间发展农业和轻工业。<sup>④</sup> 谷春帆的这一工业化发展战略与翁文灏为代表的赶超战略和马寅初为代表的平衡增长战略均不相同。<sup>⑤</sup>

谷春帆发现,进行重工业建设,不能事事都自己生产,制造飞机要2万零件,制造汽车要5千多种零件,不可能每个零件都自己生产,自己仅需要生产有销路有基础的一部分,其他依靠国际贸易。“各国之兴办工业,大多均系在纵的横的关系中,割取其任何一截,以期最能适应当时之环境与当时之需要。有所不足,取之于别国进口,有余则消〔销〕之于世界市场。俟后再向两方面发展,横的发展,Keynes 所谓 Multiplier 的联系,纵的发展, Hayek 所谓 Roundabout 的联系。”<sup>⑥</sup>由此可知,谷春帆认识到进行重工业建设不可能同时实施在各个部门进行投资的平衡增长战略,由于资源的稀缺和市场的狭小,只能优先发展产业链中有基础有市场的部分基本产业,以此逐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一思想与赫希曼(A. O. 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非常相似。

谷春帆还论述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互之间的配合,以及国内产业与国际贸易的配合等问题,他强调了农、轻、重的平衡以及他们与国际经济的平衡,从这个角度分析,谷春帆又是与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相似的平衡增长论者。

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的平衡增长战略与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和谷春帆发展战略认识立场不同,欧美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你们应该这样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谷春帆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国防安全,我们必须和只能这样做。

### (六) 国际合作论

所谓“国际合作”,就是“对外开放”和“利用国际资源”,它包括利用外资,参与国际贸易,引进技术和人才。

关于利用外资,谷春帆认为中国资本太少,蓄积困难,只有利用外资;中国企业管理人才缺乏,可以引进外资以为示范;打破农工两业互相牵制的恶性循环,也只有利用外资。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国利用外资论的代表。<sup>⑦</sup>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前提》,《经济动员》第2卷第2期(1938年12月)。

②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83、187页。

③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4—88页。

④ 谷春帆:《中国经济计划及组织问题》,《复兴关月刊》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

⑤ 孙大权:《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⑥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8页。

⑦ 杨叔进:《中国的工业化与资本来源问题》,方显廷编:《中国战后经济问题》,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18页。

谷春帆反对使用“民族资本”概念,他说:“资本而云民族,实在有些牵强。实业之组织,可有种种方式。中国人之资本,可与外国之劳力及原料结合,外国之资本亦可与中国之劳力与原料结合。……一个外国工厂在中国雇用中国劳力及原料生产,对于中国整个经济之利益,恐怕要大于一个中国工厂而使用外国原料之民族资本的生产。普通仅从资本家的立场来观察,而忽视工人及整个民族之利益,至甚只从工业资本的立场观察,而忽视原料生产之利益。”<sup>①</sup>谷春帆指出了外国资本对本国有就业效应,经济拉动效应(带动原料生产)。中资外资对经济建设都各有贡献。1947年,谷春帆甚至提出外资是中国工业化的救星,他说:“中国所反对的乃是帝国主义式的政治投资。至于以公平条件来开发中国,使中国工业化的资本人才,乃是中国的救星。”<sup>②</sup>

关于国际贸易与工业化。谷春帆在设计“五年计划”时发现,国内各产业和各种产品难以做到计划配合完好,主观计划生产的产品必然出现过剩与不足,必须依靠国际贸易。“我们所需要的,他们有得多,我们嫌多的,他们不嫌多。因为我们只是世界中的一国,而他们是整个世界,范围大,伸缩性大。我们只要能出相当价,我们终能买到我们的所需,我们只要肯贱一些价,我们终可售出我们的余剩。……我们可以进一步,专门发展若干特产,使其出口。而同时对于国内生产,无经济根基的产品,则专从外国进口来。彼此互易,亦即彼此互助。”<sup>③</sup>谷春帆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一国的计划经济如要成功,必须依靠国际市场。他指出的“我们只是世界中的一国,而他们是整个世界”,“彼此互易,亦即彼此互助”,这些言论也极为精辟。

对于国际贸易政策,谷春帆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应减少消费品输入,鼓励输出,以便国内积累资本。关税政策应分三阶段,一是工业化启动,应鼓励所需资本品的进口,二是国内产品替代成功后,实施教育性保护关税政策,三是技术进步、成本减轻后,逐步取消保护关税。<sup>④</sup>

总之,谷春帆认为:“中国工业化,在资本、原料、人才三方面均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工业化“有许多困难,可望从国际合作中得到解决,重工业及基本工业所需之资本以及大规模开发所需之资本,希望友邦可以投资或借款,不足的资源原料希望从国外输入,眼前需要的技术工人人工头技师,希望可从友邦借聘,企业人才与经验,可以向国外实习,亦可欢迎外国投资来中国示范。”<sup>⑤</sup>

中国近代主张利用国际合作推进工业化的经济学家不乏其人,如马寅初、刘大钧等。谷春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中国工业化的诸多困境出发,论述了国际合作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是中国近代论述对外开放最彻底的思想家之一。

西方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强调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战略,普雷维什(R. Prebisch)的“依附论”更主张国际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中国和东亚经济体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谷春帆的国际合作论比普雷维什等人的理论可能高明得多。

### (七)混合经济制度论

谷春帆认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有三种:做、管、放。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是国家自己“做”,德、意为代表的统制经济是“管制”人民去做,英、美为代表的自由经济是“放任”人民去做。他们之所以采纳不同制度,完全是因其本国历史环境不同。中国选择经济制度,也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因此,“三种经济形态,任何一种单纯的形态,对中国均有不宜。——中国工业化的形态,因为事实关系,势所必然,亦将为一种混合的形态。就是说,国家自己计划自己做。同时也鼓励也放任私人去做,而给予一种指导及管制。他将并合计划经济、放任经济、统制经济、指导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之前提》,《经济动员》第2卷第2期(1938年12月)。

②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97—198页。

③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7页。

④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104页。

⑤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93—194页。

经济,而于每种形态中采取一些。”<sup>①</sup>

谷春帆还指出,在混合经济制度的三种形态中,在工业化建设初期应强调计划,但计划经济仅是过渡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成分应逐渐淡出,让位于指导经济和放任经济。他说:“计划经济,是从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中,谋经济力量之增长。但这是过渡办法。到经济力量增加之时,计划统制的程度,应当一天一天减轻。让渡与自由放任之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经济,全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国防公共工程之类。国家仍要有计划来办理这些事业。但其办理是代替人民处理公共事务,而不是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在中国的情形下,我希望经过二、三期国家建设以后,人民富力增加,国家计划统制指导的成分,即可逐渐减少。所以在我的系统中,放任经济是渐增重要的项目。与苏联式的计划,与德意式的统制,不同在此。”<sup>②</sup>

关于政府计划与私人经济的关系,他说:“在我们的混合经济下,我们只在整套配合的经济联系组织中,抽出一小部分来计划,其余我们仍旧容许私人自由。所以计划如有脱节之处,我们一方面可以修正计划来补救,一方面我们仍可藉物价机构来调节,产多价跌,产少价高,私人经济可以希望其做到调节响应的工作。”<sup>③</sup>

关于政府如何调节社会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他说:“吾们对于所有权及经营组织切须分别,平均地权,是平均土地之所有权。节制资本,是节制资本之所有权,此乃崇高之社会理想,颠扑不破。但土地所有权虽分散平均,而其经营组织,不妨集中而为大农场,苏俄之集体农场即是。资本之所有权虽受节制,而其经营组织,亦不妨集中为大规模之生产事业。两者原不相抵触。故政府之分配政策,对人民各阶级间,如欲节制资本之所有权,而使大规模产业又得成立,则当增加中下级之收益,而又充分鼓励之,使投资于政府指导之事业。如此,则公司组织,股票市场,均须积极推进。”<sup>④</sup>此段讨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产权应注重平等,经营权应注重效率,增加中低收入者收益等问题,对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主张混合经济制度的学者有马寅初、何廉等人,谷春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主张的混合经济制度既强调政府作用、又重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总体上是偏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并提出政府职能应根据工业化不同的阶段而改变。这些距今70多年的思想仍然没有过时。谭崇台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偏重计划化,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偏重市场机制,而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已经逐渐成为不少发展经济学家的共识。<sup>⑤</sup>可见谷春帆的思想已经达到了发展经济学第二、三阶段的认识水平,具有前瞻性。

### 三、谷春帆是中国和世界第一代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

前文概述了谷春帆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发展理论能够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吗?他在中外发展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呢?他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对我们今天又有何启示呢?以下对这三问题分别论述之。

第一,要回答谷春帆的理论能否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就需要论证和说明他研究的主题是否与现代发展经济学相一致;他提出的理论是否进行了严密经济学论证并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质;他提出的理论是否能够经住经济发展经验事实的检验等问题。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16页。

②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22页。

③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86页。

④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第76—77页。

⑤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第278页。

关于研究主题。谷春帆持续研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10 年以上,他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提》(1937 年)、《中国工业化之前提》(1938 年)、《中国工业化之国内资本问题》(1940 年)、《战后中国利用外资问题》(1942 年)、《工业建设计划之配合》(1943 年)等,专著有《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中国工业化通论》(1947)两本。这些论著涉及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国际资源的利用、发展的优先次序选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sup>①</sup>以 1938 年发表的《中国工业化之前提》一文为例,谷春帆在此文里研究了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战略、农业改良与工业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利用外资、经济制度选择等问题。在一篇论文研究了如此多的发展问题,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史中恐怕也是罕见的,何况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的 10 年前。总之,谷春帆研究了发展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基本问题。

关于理论的逻辑论证。首先,谷春帆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探讨了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所提观点进行了严密的经济论证,他还应用了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发展问题。其次,他提出了发展的核心概念,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资本蓄积、农业改良等。他抓住了发展的本质,提出了“工业化通论”“资本蓄积论”,这是中国版的“唯工业化理论”“唯资本理论”,而这二大理论恰恰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的核心理论。谷春帆提出了“混合经济制度论”“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国际合作论”,这三个理论又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第二阶段强调市场作用、农业贡献、对外开放三大核心论点相似。<sup>②</sup>再次,初步构建了“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体系,如图 1 所示,其论证逻辑前后是一致的。

关于理论与事实的检验。谷春帆提出成体系经济发展政策组合(参见图 2),令人惊奇的是,比较经济学家雷诺兹(L. G. Reynolds)于 1971 年开出的发展中国家政策清单与谷春帆几乎完全一致。<sup>③</sup>图 2 展示的以工业化建设为中心开始,到建立混合经济制度结束,谷春帆几乎每一理论和政策均得到了日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验证。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已经成为“中国道路”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从研究主题、理论的逻辑论证、理论的事实检验三方面分析,谷春帆已经不仅仅是提出了发展理论的片言只语和一般的政策主张,而是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有现代经济分析的经济发展理论。

第二,要评价谷春帆在发展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就必须将他与其他中外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第二部分对其“七论”中的每一论均进行了比较分析,以说明谷春帆每一论均有其独特之处。以下需要进一步探寻的是,谷春帆整个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在中外经济发展思想史中的地位。

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涌现了一批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专家,如陈长蘅对于人口,翁文灏对于资源,马寅初对于资本,董时进、巫宝三、张培刚对于农业改良,刘大钧、方显廷对于工业化的调查与统计等等,各有专攻。在这批专家中,张培刚等人认为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sup>④</sup>他们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那么,名气和影响似乎还不如他们的谷春帆,能否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理论的代表?其学术贡献的特点在哪里呢?这就需要将谷春帆与刘大钧、方显廷、张培刚三人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进行比较分析。

刘大钧(1891—1962)从 1916 年开始研究中国工业化,其代表作为《上海工业化研究》(1936

① 《谭崇台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5 页。

②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11 页。

③ [美]劳埃德·G·雷诺兹著,朱泱等译:《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93 页。

④ 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 页。

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937年)、《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年),前两本主要是关于中国工业的各种统计数据及其分析,后一本是刘大钧在工业化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将《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与谷春帆的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在研究主题方面,刘大钧涉及到了谷春帆“七论”的几乎所有内容,但刘大钧的注重点是工业化的含义、国际贸易的作用、工业化与农业的关系、产业政策、经济制度、工业区位等问题,他对资本积累、人口问题没有深入论述。其次,在理论的经济学论证方面,刘大钧将马歇尔、凯恩斯、阿尔弗雷德·韦伯(A. Weber)等西方理论同中国工业化经验事实相结合,对所提观点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分析与论证。他在国际贸易对工业化的促进以及工业区位等问题方面比谷春帆的相关论述深入。同时,他在论述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方面却没有谷春帆全面。刘大钧与谷春帆在不同发展问题方面的经济分析各有千秋。差别在于,谷春帆发展理论以“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为核心,刘大钧的所有论述似乎还没有发现类似的中心线索。再次,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刘大钧主张工业化“实为我国唯一之出路”,农业与工业应避免冲突、平衡发展,利用外资积累资本,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注重发展与国防相关的重工业,发展国际贸易以带动工业化,在采取计划与统制经济制度的同时实施放任经济。<sup>①</sup>这些政策主张与谷春帆的主张大体相似。若仔细分析,药方虽一样,用药量却差别较大。比如,刘大钧是“工业化中心论”,谷春帆却是“唯工业化中心论”,刘大钧是以统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制度,谷春帆却是以自由经济为目的的混合经济制度,等等。总之,在研究主题、理论论证、政策组合等方面,刘大钧与谷春帆同中有异。刘大钧在工业化调查和统计资料收集方面的贡献超过谷春帆,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性和政策主张的针对性方面,谷春帆似乎略胜一筹。

方显廷(1903—1985)从1929年开始研究中国工业化,其关于工业化调查与统计的著作甚多,<sup>②</sup>体现其工业化思想的代表性论著有《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1935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1939年)、《战后中国之工业化》(英文,1942年)等。方显廷研究涉及资本、劳动、资源、战略、制度等众多经济发展问题,与谷春帆在研究主题方面差别不大,但在经济发展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方面却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关于理论的逻辑论证,方显廷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工业化的现状是什么,将来怎么办,对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不多且不太深入,他也很少应用凯恩斯、哈耶克等西方流行的理论解释中国工业化。而谷春帆却注重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并进行系统的经济学论证。其次,关于发展的政策主张,方显廷承认自己没有系统的战后经济建设计划,<sup>③</sup>谷春帆却在《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等论著中提出了较系统的战后经济建设主张。而方显廷的政策主张前后变化较大。抗战前他主张重点发展轻小工业,1939年后却主张重点发展重工业;<sup>④</sup>1939年主张“应仿苏联先例,力事积聚民族资本,虽间亦利用外资,但务须保持主动地位。”<sup>⑤</sup>1941年后却主张应积极引进外资。<sup>⑥</sup>而谷春帆的政策主张前后变化不大。另外,方显廷与谷春帆具体政策主张差异明显,方显廷主张的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平衡,<sup>⑦</sup>谷春帆主张的是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相互

① 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刘大钧七项政策主张分别来自第3、87、24、23、75、47、34页。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览》(1949年)列出了14种。参见《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389页。

③ 方显廷:《战后中美经济合作》,方显廷编:《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5页。

④ 方显廷:《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1935年),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02页。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之筹集与运用》(1939年),方显廷编:《战时中国经济研究》,第99页。

⑤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之筹集与运用》(1939年),方显廷编:《战时中国经济研究》,第95页。

⑥ 方显廷:《战后中国之工业化;中国之工业资本(英文本)》(H. D. Fong,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1942),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7页。

⑦ 方显廷:《论农业与工业之关系》,方显廷编:《战时中国经济研究》,第33页。

平衡;方显廷强调的是发展民族资本,谷春帆主张资本不应分民族;方显廷主张国营、民营、合作社三种经济制度的混合,<sup>①</sup>谷春帆主张计划、统制、放任三种经济制度的混合。总之,方显廷在人才培养、工业化调查、经济建设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贡献相对较少,而谷春帆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多贡献。

张培刚(1913—2011)最初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农业经济,其代表作为《农业与工业化》(1949)。他与谷春帆的经济发展研究区别明显。首先,关于研究主题。资本形成或资本积累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张培刚因从技术方面去定义工业化,因而没有讨论资本形成问题,<sup>②</sup>他到1991年时才进行了弥补。<sup>③</sup>而谷春帆对资本积累进行了重点论述。其次,关于理论的逻辑论证。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培刚采用了经过修正的新古典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繁征博引,其论证过程的精密与“规范”是谷春帆所远远不及的。另一方面,从论证的结论看却是另一番景象。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关系论是张培刚与谷春帆发展理论的共同核心。张培刚强调了工业化对农业改良的促进作用,至于农业改良对工业化的贡献,他虽然提出了农业与工业相互之间有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四大联系,却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对工业化的四大贡献,<sup>④</sup>因为“工业”不等于“工业化”,“联系”不同于“贡献”。张培刚认为:“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这就是说,在未来经济大转变的过程中,农业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但比较被动的角色。”<sup>⑤</sup>而谷春帆对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并且明确提出了农业改良对工业化的四大贡献。再次,关于发展的政策主张。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主要是总结欧美、日本、苏联等工业化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偏重于阐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没有明确的系统的针对欠发达经济如何发展的政策主张。而谷春帆直接针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发展政策组合。总之,在按照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严密的学术论证以及成果的西方影响方面,张培刚超过谷春帆,在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性和政策主张的有效性方面,谷春帆可能超过张培刚。

综上所述,谷春帆与刘大钧、方显廷、张培刚三位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家相比,在研究主题、经济分析、政策主张等方面似乎并不逊色。特别是他从1937年开始就构建了一套逻辑一致且能经历住实践检验的发展体系,在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方面谷春帆似乎还略胜一筹。因此,谷春帆与刘大钧、方显廷、张培刚等人同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

谷春帆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相比(参看表1),他的代表作发表时间比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等人早;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指出,他的发展理论与纳克斯、舒尔茨、罗森斯坦-罗丹、赫希曼的理论相似,与刘易斯、普雷维什不同,不管是同与异,谷春帆的理论均有其独到之处;在经验来源方面,谷春帆完全采自中国经验,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其他发展经济学先驱“往往是从小小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取证的”,如刘易斯对牙买加的观察,舒尔茨对于印度一个小地区的调查。<sup>⑥</sup>在理论来源方面,谷春帆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均来自现代经济学。总之,谷春帆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以前,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在理论论证方面他与其他发展经济学先驱也许各有千秋,谷春帆可能还稍逊一筹,但在理论主张与事实验证方面,谷春帆却并不亚于其他发展经济学先驱。因此,谷春帆的贡献完全可以和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等人并列,他也是世界第一代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

① 方显廷:《战后中国之工业化;中国之工业资本(英文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8—79页。

②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82—85页。

③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④ 孙大权:《张培刚学术与思想几个问题的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第242页。

⑥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第351—352页。

表 1 谷春帆与发展经济学先驱比较表

姓名	代表作发表时间	主要理论	经验来源	理论来源
谷春帆	1938、1945年	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相互牵制论	中国	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马歇尔等
罗森斯坦-罗丹	1943、1957年	大推进理论	东南欧	新古典经济学
普雷维什	1950年	依附论	拉美	结构主义
纳克斯	1953年	贫困的恶性循环论、平衡的经济增长论	欧美	古典经济学
刘易斯	1954年	二元经济论	中美洲、加纳	古典经济学
赫希曼	1958年	不平衡经济增长论	哥伦比亚	新古典经济学
舒尔茨	1964年	改造传统农业论、人力资本论	印度、危地马拉	新古典经济学

资料来源:杰拉尔德·迈耶等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中译本);杰拉尔德·迈耶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中译本),等等。

第三,谷春帆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启示。近代以来,西方控制了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欠发达经济体如何发展的一门经济学,发展中国家本应有更大的发言权,而流行的说法却是,这门学问仍然需要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去“代劳”。谷春帆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能够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他们对发展有强烈的愿望,而非欧美经济学家的同情怜悯。他们对不发展有切肤之痛,而非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隔靴搔痒。只要他们掌握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就能够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更加接地气的理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应该对此充满自信。

谷春帆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至今仍有解释力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中国经济学家结合中国实际使用中国语言叙述的中国故事。再现谷春帆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外发展经济思想史以及创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可以提供思想启示,特别是可为树立中国发展理论的自信提供理论支撑。张培刚指出,国内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采用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成果,而忽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实,在东方,也有我们自己的理论。”<sup>①</sup>谷春帆的理论就是被忽视的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 Gu Chunf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Sun Daqua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roposed by Gu Chunfan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economics. Firstly, Gu Chunfan covered almost the full range of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Secondly, he initially built the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the core of 'mutual containment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irdly, many of his proposals have been proved right and become part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such as focusing on industrialization, synchronicall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up policy. Gu Chunfan's theory is China's story to describe Chinese situation in its own language considering the real context and still with explanatory power. Hi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dicat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sts can cre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tailored to their own conditions.

**Key Words:** Gu Chunfan; Core of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责任编辑:王小嘉)

<sup>①</sup> 张培刚、张建华主编:《发展经济学》“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